

驻京部队和国家机关干部参加的万人“批林批孔”动员大会，她和迟群、谢静宜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。这样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便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，“批林整风”运动忽然变成了“批林批孔”运动。

江青在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中，插手北京军区部队。她抓了北京卫戍区某师6连和保定某军8连，作所谓“批林批孔”的试点。她以个人名义给连队写信，送了上百种材料和书籍，如《儒法斗争史讲稿》、《孔丘和儒家的丑态》、《历代劳动人民反孔斗争资料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弟子规》、《神童诗》、《女儿经》、《名贤集》、《四书评》等等。这些书，连队干部战士读都读不懂，联系“批林批孔”更难对上号。江青就派人去参加，组织阅读、批判，搜集情况，直接向她作报告。

2月4日和6月20日，江青先后两次把连队部分干部战士召到北京来，听发言、汇报，作指示。她还抽调1个连队指导员和5名战士，到湖南搞了3个多月的调查；派战士到全国各地的批林批孔点上送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（未定稿），搜集了解情况。江青到天津某军9连，听发言汇报，观看军事表演，打靶、骑马、照像、唱“样板戏”。她到保定某军8连，还仿照毛主席颂南京路上好八连诗的韵律，作了两首歪诗送给部队。胡诌“孔孟道，流毒广，帝修反，因袭用，为了扫除害人虫，必须批林又批孔”，等等。她到部队颐指气使，胡言乱语。

江青还派没有军籍的记者到军区机关搜集情况。规定

记者可以参加包括军区党委常委会在内的所有会议,看军区的所有文件,还可以查阅档案材料。有的记者政治上很敏感,如《人民日报》的一个记者,觉得势头不对,向军区要了皮大衣、皮帽子、皮鞋、皮手套,到驻内蒙古二连的边防团去了,再没有到军区机关;新华社的一个记者向我说,他不参加无“批林批孔”内容的会,不看“批林批孔”以外的文件,也不写《内参》。

北京军区的“批林批孔”运动,在江青的亲自“关怀指导”下,搞得热闹非凡,乌烟瘴气。我们于2月、3月两次召开军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,传达江青接见6连、8连的讲话。8月,召开基层“批林批孔”经验交流会,江青让天津火车站工人代表和蓟县小靳庄贫下中农代表介绍“批林批孔”经验,让某教授作儒法斗争史报告。这次会开了近一个月,印发的经验、资料及书成堆,散会时有的军级单位是用卡车拉走的。在全国“批林批孔”又夹着批“走后门”,叫“三箭齐发”,在北京军区是乱箭齐发,又把“文化大革命”以来的问题翻腾了一遍,我和机关二级部以上的一些领导同志,又受了一次批判,给我算了一次总帐,检查了14个方面的所谓错误。

“四人帮”利用毛主席对一本书、一出戏、一篇文章的谈话、批示,掀起一个又一个浪头,如评《水浒》、批“经验主义”等。“四人帮”操纵的“批林批孔”运动的主要内容,既不是认真地批判林彪集团的各种罪行,也谈不上以科学的态度批

判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。他们不过是利用两千多年以前孔子说的“克己复礼”，“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”等语句，借题发挥，另有图谋。他们不批林，假批孔，以“评法批儒”、批“宰相”影射攻击周总理。从北京军区的情况看，从根本上说来这次运动是不正确的。

我在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中，头脑比较冷静。这一方面是九一三事件后，有所醒悟；另一方面是叶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，我同老帅接触多了，知道了一些情况。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一开始，叶帅就给我看了毛主席2月15日在他给主席的信上的批示：“现在，形而上学猖獗，片面性。批林批孔，又夹着走后门，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。小谢、迟群讲话有缺点，不宜下发”。后来，叶帅还向我说，毛主席7月1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当面批评了江青，并宣布：“她并不代表我，她代表她自己”，批评江青，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洪文搞宗派活动，警告他们说：“你们要注意呢，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”。1975年，叶帅给各大军区、军兵种的领导同志打招呼，传达毛主席的指示，说毛主席讲现在有个“上海帮”，你们要注意警惕，稳定部队，把部队掌握好。我向叶帅汇报过江青插手部队的情况。我调成都军区工作时，叶帅同我谈话，说我对“四人帮”的认识是比较早的，要我到成都军区后继续注视“四人帮”的活动。

我对江青有反感，一向采取避而远之的办法，有时开会为避免见面便绕道走。江青看出了我对她的态度，总想有机

会报复一下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，北京京剧团 150 多人下放到张家口驻军锻炼，按原定的锻炼时间和计划早已到期，可是国务院文化部不让这些人回京，说京剧团反江青，反对文艺革命，不要他们了。这时正好我到部队检查工作，京剧团就派代表找我，把他们的情況作了详细介绍。当时军区正筹备演“样板戏”，需要这些演员。我回京后就请示周总理，提出把这个团收归北京军区，作为军区的京剧团保留下来。周总理说：“你这个意见很好，以你们军区的名义写个报告来，我批一下。”按照总理的批示精神，这个团很快被改为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京剧团了。江青为此事大为恼火，把我叫去训斥了一顿。她对这件事耿耿于怀，一有机会就想整我。

江青在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中到处说：“陈先瑞是紧跟林彪的，是郑维山的同伙”。她到天津某军活动时，向该军军长、政委说：“陈先瑞是哪路人马，何许人也？”纪登奎对我的处境感到忧虑和不安，他以关心的口气劝道：“你抽时间到 6 连、8 连去看看，那是江青抓的点，看有什么经验，帮助总结一下。”我说：“正因为是她的试点，我才不去，别去了说错话。刚刚反过陈伯达是华北的太上皇，她现在的作法与陈伯达有什么两样！”没过多久，江青在京西宾馆开会，让她抓的试点单位介绍“批林批孔”经验。纪登奎对我说：“你去听听会，了解下情况，对开展军区的运动有好处。”我说：“她开这类会我不去，如果是军委或总部开会我去”。我没有去参加这次会议，陪陈锡联同志到北线看地形去了。

军区传达贯彻江青在京西宾馆开会讲话的会议时，我回到了北京。当晚，纪登奎就给我打电话，说第二天军区会议结束，你作个总结讲话。我对军区召开这次会议情况很不了解，一再推说不能讲，可纪登奎却一再说让我讲讲后会议就结束。就这样，我根据自己对“批林批孔”的理解，讲得很随便。我说：“对批林批孔运动，我们还不够理解，现在要一面学习一面搞运动，在精神上要准备挨点批，挨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……”可是没想到，河北省军区的人把我的讲话内容告到了江青那里，江青按捺不住对我的怒火，于5月12日给王洪文、叶剑英、张春桥、邓小平、纪登奎、陈锡联写信，说“陈先瑞不带头批林批孔，不作自我批评，把矛头指向群众，借批林批孔发牢骚”，“北京军区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不力”等等，弄得军区领导很紧张。

当天晚上，陈锡联、纪登奎召开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，传达江青的信，对我进行了批评。我于5月13日写了经陈锡联、纪登奎同志转给江青的检讨，说江青“对我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，指出我的错误的严重性，这是对我的关怀和挽救，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。同时，对我们军区的批林批孔运动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有重要意义。”这个违心的检讨，是陈锡联、纪登奎同志为保护我过关，亲自帮助写的。

但是，不久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，江青说：“陈先瑞不批林不批孔，历史上也有问题，要审查。”周总理打断了江青的话，说：“陈先瑞的历史是红的。在陕南独立坚持游击战

争时很有影响,是我派人与他联系上的,以后一直在延安。抗日战争后期,毛主席把他派了出去。让他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时,毛主席还问过他的情况,说陈先瑞曾大闹过华山,国民党赏几万大洋要他的人头呢。”由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保护,才使江青的阴谋一直没能得逞。

在成都军区任职

十年动乱还没结束,我就被调出北京。1975年10月3日,中央军委公布了我任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的命令,同时担任中共成都军区委员会书记。我当时就表态,坚决服从组织安排,交接工作后即刻到职。

在我去成都之前,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找我谈了话。叶帅对我到成都军区工作有明确的指示,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要少说话,慢表态,多听、多问、多了解情况。当时“四人帮”还在横行,动乱中的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,各色各样面孔的人员都在上上下下、台前幕后的活动。叶帅能及时给我以提醒,我从心里感谢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师。

10月23日,我同在北京开会的赵紫阳、秦基伟、刘兴元一起乘飞机到成都任职。

从北京军区到成都军区,虽然都是做军队工作,但工作环境换了,机关的人员不熟了,部队的情况不明了。我本着调查研究,从头学习的态度,在和军区领导班子成员见面

后,经主管领导同意,先深入机关和部队进行调查研究,熟悉情况,以便为做好工作奠定基础。

我大约用了两个月的时间,先在成都市内了解军区司政后三大机关、直属队情况和四川省军区、某军领导班子情况,而后是下部队,跑了两个军部、6个师、7个军分区。调查中,我先听机关领导和军、师、团党委汇报,然后个别交谈,既了解机关和军、师、团各级班子干部情况,也了解了部队建设情况。我每到一地,还抽时间到干休所看望离退休的老同志,倾听他们的意见。我每到一单位调查研究,都向军区党委有报告或汇报,实事求是地反应调查到的情况,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,供军区党委指导部队建设时参考。

调查中,我深深感到“文化大革命”给军区机关和部队带来的危害之大。特别是军区机关,几乎“文革”中的几次大的运动都折腾到了。反复搞运动,这次整了你,下次又批了他,人人心里都有一股怨气。我对这方面情况的反映,只听不问,不当裁判员。注重调查部队建设上的问题,主要是训练、管理、生产等。此期间,军区召开的各种大会小会,凡涉及以前运动中的问题,我都不发言,不讲话,努力做团结鼓劲工作,引导机关的同志团结一致向前看,步调一致抓工作。

12月下旬,我从重庆某军调查后刚回到军区,就感到肝区不时隐痛。开始以为这一段劳累了,过几天就会好的,哪知越来越重,先后到军区门诊部和四川省医院作了检查,